

主编 / 季羨林

卞毓方

• 吉林摄影出版社

煌煌上庠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煌煌上庠

卞毓方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 20… II . ①季… ②谷…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煌煌上庠 卞毓方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 - 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卞毓方】1944年生于江苏。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日本语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现供职于《人民日报》文艺部。

卞毓方曾以记者知名，1995年以来致力于散文。他的作品或如天马行空，大气游虹，或如清风出袖，明月人怀，颇受读者喜爱。先后出版散文集《岁月游虹》（作家出版社）、《雪冠——卞毓方散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等，代表作《煌煌上庠》荣登《散文选刊》“1998年散文排行榜”，1999年在《十月》开设“长歌当啸”散文专栏。

目 录

作者小传	(1)
煌煌上庠	(1)
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	(15)
高峰堕石	(33)
张謇是一方风水	(51)
谁也不能就圣经向上帝责疑	(61)
犹太三星	(75)
北大三老	(82)
一轮满月挂燕园	(89)
拳坛独语	(94)
雪冠	(98)
天涯海角	(102)
泉州帆影	(108)
烛影摇红	(113)
壮士天涯	(117)
星明欲坠下的千斤顶	(122)
烟云过眼	(126)
“走出房门”	(132)

目

录

煌煌上庠

—

这就是蔡元培（子民）的塑像，坐落在未名湖南岸的春风中；大理石奠基，汉白玉砌座，青铜铸身；说是身，只是自腰而上，端肃凝重的一尊胸像；先生背倚土山，坐北朝南：左临六角钟亭，当初选址的时候，应是考虑到了他黄钟大吕般的人格气韵；前面是一方草坪，柔柔的，嫩嫩的，空气般清新，晨梦般飘逸，铺出一行行的绿诗、绿歌、青波、青浪，即使在冬季；右侧是挺拔健美蓬勃向上的杂木林，那该是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在承领先生的耳提面命。记不清已有多少次了，从去年金秋开始，为了明年北大百年校庆这个挥之不去却之复来的情意结，我打老远老远的城里跑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在这方净土穿梭寻觅，缅怀俯仰。偶而停下脚步来瞻仰塑像，先生之于我，是永远不变的温柔敦厚，慈祥恺悌；诚如罗家伦的赞语：“汪汪若万顷之波，一片清光，远接天际……”

今天情形略微有异，也许因为今天是“五四”，恰值

北京大学九十九周年校庆，它使我想起了先生当年眼底的烟云，所以，不管如何变了角度端详，总觉得先生的目光微含忧郁，抑或是期待；淡淡的，淡淡的，像是壮士闻鸡，又像是英雄凭栏……

想想也是，蔡元培诞生于 1868 年 1 月 11 日，按农历，属兔，到他 1916 年 12 月 26 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满打满算正好五十岁，站在五十岁的高度上倚风长啸，苍茫四顾，自他的双眸中射出的，是一股凛凛的心灵之光，它犀利似剑，泠然有声，凝聚了无穷的历史感悟。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二

蔡元培投身教育，始于他三十二岁，也就是 1898 年。在那之前，他是十七岁的秀才，二十三岁的举人，二十六岁的翰林，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中国文人历来最看重官运，他们生命的冲动大都是围绕着一官半职转，转上去就意味着飞黄腾达，转不上去就只有落魄潦倒；即使落魄潦倒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丝痴念，也仍旧围着考场呼悠悠地打转。“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流传在陈独秀家乡安庆一带的这句俗谚，勾勒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悲哀的然而又是无可逾越的价值取向。但是，在 1898 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戊

戊变法，百日维新。变法维新是以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的善良愿望为基础的，结果，却以顽固派复辟、六君子喋血、康梁狼狈远逃告终。“徒将金戈挽落晖”；变法的失败像一声警钟，敲碎了许多士人的迷梦，也使蔡元培猛然惊醒。就在这一年的秋冬之交，他突然解缆南去，头也不回地驶出了宦海——先是就职绍兴中西学堂，继而改教上海南洋公学；从此天涯轻舟，愈驶愈远。

1916年底，蔡元培旅欧归来，飘然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过南北两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因此，比较起他的前任内阁大员的身份，北大校长自然算不上一个显赫的位置。何况，这所结胎于戊戌维新的大学堂，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摧残下，已是一片乌烟瘴气，北大校长的座椅，也就成了一块烧红的烙铁，谁坐了都要烫得跳。举例说，1912、1913两年，校长就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依次是：严复、章士钊、马良、何时、胡仁源；其中，章士钊根本就没有到位。现在，蔡元培来了。蔡元培对这个新职位显然情有独钟，尽管同党中有很多人反对，包括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他还是决意就任。蔡元培的抉择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理解蔡元培，我们说，有这一票，就足够了。追究蔡元培的生命曲线，他多年来外搜内求、梦寐以寻的，其实也正是像北京大学这样一个舞台。人是离不开舞台的，和他先后挂冠南下的张謇、张元济，如果不是分别抓住实业和出版业，又岂能在民国的地平线上再树起一道瑰丽的风景！蔡元培瞩望于北京大学，就像阿基米德眼中那个能撬动地球的支点，

它的价值，不在于多么枪眼，也不在于多么崇闳，而在于顺天承势，得心应手，把一己的才情抱负，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最大限度。

三

蔡元培是带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八字方针进入北大的。不要小看了这八个字的份量，它上承着诸子百家纵横捭阖的春秋战国，外映着欧洲大陆飘发电举的文艺复兴，下启了四十年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后一点是我的姑妄之论。我总觉得，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上述口号，多少有蔡元培振兴北大的影子；考虑到毛泽东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对当日龙腾虎跃、万马奔驰的景观有过直接的感受，这猜测至少也有一点历史的依据吧。言归正传，前面说到，北大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摧残下，已成了旧思想旧文化的营垒。蔡元培如今要来拨乱反正，“思想自由”也好，“兼容并包”也罢，当务之急，就是要物色一位新学的领军人物，给北大一阵狂飙，给文化一道闪电，给社会一个震撼。环顾天下，谁能当此大任呢？

蔡元培把目光投向正在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陈独秀，安徽安庆人。生于1879年10月9日，小蔡元培整整十二岁，也属免。若以年龄划分，他是蔡元培的晚辈，若以功名计算，他在科举的台阶上只走到秀才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这一级，比蔡元培要低得多，但在民主革命的资历上，却堪与蔡元培媲美。陈独秀在二十刚出头的浪当年纪，就以《国民日报》、《安徽俗话报》为阵地，宣传反帝爱国，启迪民智；三十出头，便出任民国政府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擂鼓助威。二十世纪早期，陈独秀的大名是带有电闪雷鸣的，那个时期青年人对他的崇拜，远远胜过近来的追逐港台歌星，因为，那不仅仅是一种青春的骚动，更是一种灵魂的苏醒，人性的张扬，生命的呐喊。

云从龙，风从虎，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遇合，常常给人适逢其时的美感。蔡元培这里正要找陈独秀，陈独秀那边厢已在北京等候了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从上海进京，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其时，陈独秀为了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业务，也到了北京，住在前门外一家旅馆。蔡元培得到消息，就效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再三再四地前往拜访，礼聘他出任北大文科学氏。那时电话没有普及，不能预先通知，为了确保抓住对象，蔡元培每次总是很早就从家里动身。有一回，蔡元培到了旅馆，独秀先生犹自作“卧龙”，酣睡未起。茶房欲上前叫醒，蔡元培不让，兀自搬了一张小凳子，坐在房门外苦等。如此诚心诚意地邀请，陈独秀显然被感动了。但他仍有犹豫：“我来北京，《新青年》怎么办？”他问。按说陈独秀对《新青年》是相当看好的，他自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当然要抓住刊物不放。对这

一点，蔡元培予以充分理解，爽快地说，“那没有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一件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就这样一锤定音。人们看到，蔡元培把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从上海接到北京大学这个煌煌上庠，等于是把他从草莽状态推到时代舞台的前沿。历史再一次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一个人或一个刊物的生命被激活，是如何最终影响了一个时代。

陈独秀一人最高学府，注定了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也即将循踪而至——他就是胡适。

胡适这时候正在美国留学。他生于 1891 年 12 月 17 日，小陈独秀十二岁，蔡元培二十四岁，巧得很，也属兔。若以年龄划分，他该是未来北大“兔子党”的第三梯队了（除蔡元培、陈独秀外，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等名教授也都属兔）。这也是一只不安分的小兔。他属于庚子赔款的第二批留美生，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农科、文科、主修哲学，兼修英国文学、经济还有政治理论等等，研究来研究去，此君突然越出专业，对故国的“白话文”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胡适认为中国古文是一种“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已经失去了生长前进的力，要创遣出新文学，必须采用新鲜活泼的白话语境；1915 年 9 月，他在赠友人梅光迪的诗里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请注意，胡适在这儿率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在异域，在华人留学生这个小小的圈子里，引来的几乎都是讥讽。胡适被激怒了，自尊与自傲迫使他奋起反击；1916年4月12日，他作了一首《沁园春》自励，并在词的下半阙大声疾呼：“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说是“文学革命何疑！”，气壮得很，然而，毕竟是书生间的斗狠，沙龙里的清谈，真地拿到社会上去检验，效果怎样，心里还没有底。这年11月，胡适把他的主张加以小心翼翼地改制，归纳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其要点是：（一）须言之有物；（仁）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个调门，比起他的“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宣言，要低了几个八度。文章写成后；胡适用复写纸抄了两份，一份给了《留美学生季刊》，另一份呢，他壮着胆子，寄给了远在上海的《新青年》。胡适万万没有想到，这篇试探性的“刍议”，正搔着老牌革命家陈独秀的痒处。他一眼就看出了它“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的革命实质，很快就予以发表。陈独秀的老谋深算，还在于他不容许胡适有丝毫犹豫或退缩，更不容许“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随即作了一篇（文学革命论）为之推波助澜。他称赞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

说自己“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以为吾友之声援”；并放言，天下凡有像胡适这般勇于向封建文学宣战的，“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机遇，是百尺楼头的欢呼，胡适一觉醒来，已经是名播九州的新进思想领袖。还得继续感谢陈独秀，此公不仅巨眼识人，更兼有举贤让贤的雅量，他大度地把胡适推荐给蔡元培，欲以代替自己的文科学长地位。蔡元培呢，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老资格的陈独秀，但他对胡适也颇为欣赏，是年九月，他聘任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留美学子为北大文科教授。

北大何幸，沙滩红楼何幸，胡适身后，又迎来了李大钊（守常）。李大钊，河北乐亭人，大胡适两岁。早年留学日本，锐志揽辔澄清，与同在那里留学的陈独秀夙有交往，意气颇为相投。他于1916年回国，因主编《晨钟报》而声名鹊起。稍后又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日刊，深得章氏的激赏。章士钊、蔡元培、陈独秀，这都是一条道上的志士，彼此相知有素，相得益彰。蔡元培主事北大不久，就聘请章士钊为图书馆主任。章士钊在这个任上没有待多少天便辞职，转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以吾素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章氏日后回忆说，“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子民，学长为陈独秀，两君皆推崇守常，当然一说即行。”如此这般，李大钊就于1917年11月到北大上任了。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是北大，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以北大图书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渴骥奔泉般的热血青年。在这里，北大这个舞台是弥足珍贵的。那是“黑暗中之灯塔”（李大钊语）。或者说，那里面已经积聚并仍在积聚更多的热力，只待一声引爆便燃起烛天的火光。如果李大钊没有进北大，很可能仍在革命活动的外围徘徊，而一人沙滩红楼，情形就不同了。还是那位章士钊先生，他的观察十分到位：“守常一人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那学府，还是书声琅琅的学府，那气韵，却已是雷霆万钧的气韵。

仿佛历史感到以上三员战将还不足以构成方阵，于是派遣鲁迅出场。鲁迅是蔡元培的老部下，他当初进入教育部，就是蔡引用的。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鲁迅免不了要来帮忙。比如，1917年8月，鲁迅就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样，这也是北大历名上的一件盛事。但鲁迅那时已经三十七岁，还没有开笔写小说。他日常中教育部任职，公余研究古碑。自言“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不是民族的大悲哀！吃人者自在猖獗，生人者反而沉埋。正好在这时，《新青年》在京城祭起耀眼夺目的光环，胡适因之而一炮打响，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也因之而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地位，鲁迅按捺不住了，他也要凭借《新青年》调整自己的生命状态。这种调整，说到底就是从沉潜走向显扬，

从平静走向燃烧。1918年1月，鲁迅和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联手，加入了《新青年》的编委阵营。同年五月，他那篇讨伐封建“吃人礼教”的战斗檄文《狂人日记》，就在《新青年》呼啸问世。鲁迅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

我翻阅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的笔轻轻一点，历史禁不住为之索索颤抖。

一代文化巨人就这样从幕后走向了前台。紧接着，《孔乙己》自他的笔尖下飞出，《药》自他的笔尖下飞出，讽波、《故乡》等一系列不朽名篇自他的笔尖下飞出；鲁迅在呐喊，《新青年》在呐喊，北大在呐喊。呐喊的世纪，世纪的呐喊。“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在这里，我想起一段公案。1933年，鲁迅回忆这一段生活，曾说我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前驱者”，从前有人告诉我们说是毛泽东，也有人称之为李大钊，前者当属于特定年代的硬伤，后者多少沾点边，但鲁迅的意中人，无疑是陈独秀。

四

写到这儿，请容许我把笔锋稍稍挪开一点主题，谈谈两位当年虽不是主角，但同样引人人胜的人物。

其一：关于梁漱溟。梁漱溟当初只有二十四岁，中学毕业，在司法部担任秘书。蔡元培主掌北大不久，读了他发表在《东方杂志》的《究疑决元论》，是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的，觉得不失为一家之言，便请他来校开讲印度哲学。梁自谦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呢？”梁说不知道。蔡元培就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话说到这份儿上，梁漱溟还有什么好推脱的呢？他又岂能不为蔡元培的胸襟气度所折服？聘请的全过程，如今听起来，就像是一则童话；而且是一则遥远的无法复制的童话。

其二：关于毛泽东。1918年8月，毛泽东、肖瑜、李维汉、罗章龙等一行二十四人由湖南来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过了一阵，毛泽东决定暂时不走了，就留在北京，并且想在北大找点事干。据肖瑜回忆，他们写信给蔡元培，诉说了自己的愿望，并提出，哪怕是当清洁工也行。蔡元培阅信时，一定是有过短暂的沉思。他本人就曾留欧多年，